

戰後初期職業教育變革

文／溫志強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系研究助理）

二戰後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第四科主管職業教育；1947年5月臺灣省政府設置，改由教育廳第二科兼掌中等、職業教育。

從實業到職業教育

職業教育承自日治五年制的實業教育與兩年制的實業補習教育，於三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（1946年2月至6月）起採中國制，改為初、高級之「三三制」。中華民國之初，同清末、日本稱「實業教育」，頒〈實業學校令〉等法。1917年，黃炎培等人於上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，倡導「無業者有業，有業者樂業」；經多次倡議，於1922年促成職業教育學制，但在經濟低迷、戰亂頻仍中發展有限。

臺灣實業教育跨度至職業教育，是在日本與中華民國兩體制間的變革，同時面對戰後資源困乏的挑戰。設置簡單的實業補習學校以因應戰爭需求大量增加，其中臺籍學生占近九成，各級教育中卻罕見臺籍教師，是批評殖民教育的重點之一。不過，1947年12月組團來臺考察的上海教育界，並不否認遺存的教育體制，包含職業教育對臺灣的重要性；整體上，臺灣教育普及度遠超自稱文化發達的上海。職業教育方面，臺灣職校數占中等學校的66%，上海只有

14%，同行考察臺灣的農、工業建設論道：「與內地各省有似專門製造高等遊民的情形相較，亦不是不相同嗎？」

職業學校的變革

戰後，臺灣遵循中央政府強調的職業教育方向，教育方針採「祖國化、民主化、職業化」。1946年，教育處定「臺灣省推進職業教育計畫」，十三項目前半著重平衡地區間各類職業學校，其餘顧及經費、畢業出路、督學等項。在隸屬上，實業學校由省辦職業學校，實業補習學校改為縣、市立，設初級職校；職類上，臺澎劃分八個校區，每一校區原則設省立農、工業職校各一所，商業、海事、醫事、家政等視環境需要設置，並開放商業科招收女學生。如日治澎湖設水產專修學校，1946年改為省立澎湖初級水產職校。戰後，臺灣缺乏



▲澎湖水產職校畢業紀念照。（圖片來源／澎湖高級海事水產百年校慶網站，1948年）

護士訓練，1947年成立省立臺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。

不過，省政府是否符合中央期待，加強日治遺留的實業教育？就學生數而言，1944年實業（補習）教育學生32,718名，1946年低至23,316名，1949年來到了33,155名；其變化遠不及普通中等教育學生，自1944年29,005名至1949年76,380名的成長。兩者落差對應校數起落，1944年實業（補習）學校、中學分別為一百一十七所、四十五所；1949年職業學校、中學數量反轉為七十七所、一百二十一所，同年省政府核撥職校59.5億元（舊臺幣，下同），中學81.8億元修建費用。

反轉的現實因素是戰爭中校舍多遭波及，及戰後資源匱乏。1944年二十三所實業學校中十一所是1938年後因應戰時需求所設，期間實業補習學校則由六十所增加至九十所，倉促興起的木造校舍不如過往水泥、磚造結構。且職業教育需可觀經費、專業教師、實習設備等資源挹注，政府以「以免貽誤青年學生起見」為準繩，將部分職校整併、停辦或轉為中學。如1944年成立的彰化工業學校被炸，戰後暫避彰化商職，並與1938年的成立彰化工科學校合併為省立彰化工職。1943年家政實踐女學校計三十所，1949年存四所初級家事職校。

實習課程的困窘

原先，實業（補習）學校的設備不是長期使用，就是勉強設立、設施簡陋；戰後初期教育經費支絀，加上實習



▲省立高雄工職學生上課情形。（圖片來源／國家文化資料庫）

材料難以籌措、工廠設備有限，專業教材匱乏，職校老師只能照講義宣科，學生死記了事，犧牲了職業教育旨趣，對職校實習課程影響深遠，至1948年各校教學時數仍無法照規定施行。

為此，各方企於日治遺留設備、工場能為困窘帶來活水，也回應政府經濟建設目標；如1946年高雄工職父兄會（類似日後的家長會），由省參議員代陳請撥用學校鄰近工廠，移撥經費願由父兄會籌措，以達成實習訓練、促進生產的雙重效果。高雄工職幾經交涉未如願，僅屏東農職、新竹工職等五校獲得小型工廠撥給。

1948年教育廳編列臨時費，規畫二十七所省立職校組成生產組織，但各校所需的百萬元生產資金無法從空虛省庫撥補，另向教育部、合作金庫申請。據1949年8月《公論報》載，省立嘉義工職暑期實習生產粉筆、樟木箱、瓦片等產品，希以較低價格活絡生產，達成職業教育手腦並用的宗旨。

變革中的職校師生

戰後，分批遣回11,456名的日籍實業（補習）教育學生，之後清一色臺籍職業教育學生改受新學制，施以祖國教育。三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，國語文同實習課占每週授課時數42小時的12小時，其後國文、史地科目改為8小時。實施祖國化教育後，當局認為日治的體罰、前輩制惡習已減少，卻也同時消彌以往整潔、禮貌、秩序、服從等優點。

戰後初期職校學生，除了刻苦學習中國語文，也處於專業教材供應短缺的困境；沿用日文書籍不符體制，內地戰亂又不易運來教科書，且臺灣少有編譯能力，自製講義成為濟急的克難選項，至1949年，教本仍甚為缺乏。

此外，體制中，新興的初職教育有畢業學生技能不足應用，又與高級部課程重複的問題。研議後，於1948年在宜蘭農職率先試辦五年制教育，省立職校逐步縮減初級部，著力高級部。

1944年，實業（補習）學校教職



▲臺中高工實習課程。（攝影／余如季 典藏／余立 圖片來源／開放博物館）

員1,222名，日籍占92.7%，較中學（78.5%）、師範學校（91.3%）高；戰後，如何延攬龐大的專業教職員為政府一大課題。戰後初期，帳面上職校教職員穩定成長，1949年達3,495名，中學教職員亦自1,128名成長為4,910名，不過實際上卻面臨校園行政紛擾、薪給困乏、師資混亂之議，遭議論：「接收後經過一年的臺灣教育，……大體可以說是失敗了。……輸入向來罕見的學潮，逐漸破壞敬重師長的美風。」

據《民報》載，1947年1月前，臺北、新竹、臺中、彰化、雲林、嘉義等地以職校為主的各級學校多有罷課、罷教，事由諸如薪津無支給、臺籍教員被免、校長牽親引戚、人事財政不明等，地區各方協助調解；亦有臺中工職校方違反調解條件再現學潮，以及開南工商學生主張校園「民主化」等事。學潮突顯職教變革中師生現實的處境，二二八事件後此類爭議少有見報，1949年新任教育廳長陳雪屏著重處理學校人事、校園爭議，外省籍教師成為職教

主流。以1949年臺南工職為例，91名教師中臺籍18名，與日治情況相去不遠，外省籍師資背景遍及中、日、歐院校。

1952年，教育部新訂〈職校暫行課程標準〉；同年，「美援教育計畫」展開——設備支援、建立職業師範體制、課程實驗等，臺灣的職業教育又逢不同的境遇。☰